

变迁中的 政治机会结构与 政治参与

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图景

臧雷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变迁中的 政治机会结构与 政治参与

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图景

臧雷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迁中的政治机会结构与政治参与：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图景/臧雷振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7

ISBN 978 - 7 - 5161 - 6732 - 8

I. ①变… II. ①臧… III. ①公民—参与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410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许 琳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发展和各类通信手段革新，为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如降低了公众政治参与信息获取成本。信息是行动决策的基础，这进而也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针对当前世界各地政治参与中的新现象，国内外研究者围绕信息传播技术与公众政治参与等主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从2010年开始，笔者就中国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和新兴政治参与现象进行了持续追踪观察，本书即为此阶段性成果之一。

全书在定量和定性多重研究方法融合的基础上，引入“政治机会结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互联网新媒体、政治机会结构变迁等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路径，并基于中国案例，探索新时期中国公众政治参与行为变化特征（如参与规模、参与选择、参与策略、参与形式等），同时解析政府对此的回应策略及未来改善路径，以期为剧烈变革时期的中国政治社会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学理化的呈现当前中国政治参与、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回应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将中国实践和经验的理论化成果纳入政治科学体系之中，建构国家治理研究的新进路。下面将对全书的内容和观点进一步介绍，以利于读者阅读和评判。

首先，全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回顾性评价已有研究成果的学科分布、概念发展、理论演化、实证验证等不同进展，并指出已有文献在研究视角单一、研究内容单薄、验证结果冲突、研究方法使用不平衡、研究主题缺乏交叉验证等方面的不足，这些问题导致对此主题的研究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科学知识的增量进步。

其次，概要梳理政治信息传播载体的演化历史及不同传播载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同时着重分析互联网新媒体对政治参与影响及其在中国的现实表现，特别指出互联网在提升政治信息传播速度、延展政治信息传播时

效、拓展政治信息传播空间等方面的正面效能。当然,也指出新媒体信息传播对政治参与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对其矫正。

同时,通过比较政治参与的传统分析视角,引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在回顾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变迁的历史条件及相关实证检验基础上,本书扩展了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研究范畴,并表明其对中国政治参与解释的适应性和影响力,如在探索政治参与发生的因果机制,解读政治参与过程,链接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等方面的理论价值。指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为理解中国政治参与发生、发展及其成败提供了动态新视角。

再次,在完成以上一般性理论框架建构后,将研究视野转入中国,阐述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新媒体和政治机会结构变迁对政治参与影响的现实表现。

为进一步验证相关理论对中国实践的适用性,本书从案例实证研究和数理实证研究出发进行对比验证。案例研究部分针对中国民众常见的“信访”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表明:中国政府和公众在信访案例中对互联网技术的吸纳使用过程,以及中国信访制度变迁中所展现的政治机会窗口的开启线索,一方面展示中国政府在面对新信息技术对政治结构冲击中所具有的适应性和调整能力,另一方面也展现中国公众面对信息技术变迁,具有把握政治参与机会、调整自身参与策略的能力。数理实证部分基于中国家庭调查数据(CFPS, 2010),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建立相关模型来检验互联网新媒体使用和政治机会结构变迁等相关变量对中国村/居选举投票参与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村/居公众平均使用互联网并运用新媒体的比例越高,其整体投票率越高,此外,政治机会结构同样与政治参与正相关。但比较政治机会结构与新媒体使用两因素对政治参与行为影响程度时,发现具有信息获取作用的新媒体展现更高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信息透明度和信息公开,相比较政治参与渠道而言,对中国政治参与影响程度更大。

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本书探索将中国政治参与纳入国家治理范畴进行回应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通过对当前国家治理实践中对公众政治参与新需求的回应策略和回应政策的归纳性评估,尝试探讨其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指出当前国家治理回应的主要类型多体现在政治输入阶段(Political Input Phase),对于政治输出阶段(Political Output Phase)的国家治理回应较少;或追求短期效果改良的回应政策较多,而对于追求长期全局化制

度化的回应政策较少。面对政治参与扩大化的未来，中国治理回应的完善需基于以下逻辑进路考量：即未来回应策略需更加全面、更加连贯、更加稳健及合理运用非正式回应和特定回应政策，最终实现缔造与社会发展现实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促进高品质政治参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

目 录

导言	(1)
第一节 研究源起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	(3)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	(7)
第四节 主要研究创新	(9)
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第一节 主要研究文献宏观回顾	(11)
一 英文文献宏观回顾	(11)
二 中文文献宏观回顾	(15)
第二节 主要研究文献微观回顾	(19)
一 政治参与	(20)
二 网络政治参与及互联网政治信息传播研究	(27)
三 互联网新媒体时代政治参与理论拓展	(37)
四 政治机会结构与政治参与选择	(40)
五 政治参与兴起和国家治理回应	(44)
六 中文研究文献微观回顾	(50)
第三节 已有研究缺陷与不足	(54)
第二章 信息传播载体演化:解释政治参与新维度	(56)
第一节 信息传播载体的时代演化	(56)
一 古代政治信息传播载体	(58)
二 近代政治信息传播载体	(60)
三 当代政治信息传播载体	(63)

2 变迁中的政治机会结构与政治参与: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图景

第二节 不同信息传播载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67)
一 传统信息传播载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67)
二 互联网新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68)
第三节 新信息技术的中国现状	(72)
一 中国信息技术及互联网发展现状	(72)
二 中国新媒体发展现状	(75)
三 中国公众新媒体使用特征与习惯	(75)
第四节 互联网新媒体影响政治参与表现	(77)
一 提升政治信息传播速度	(80)
二 延展政治信息传播时效	(80)
三 拓展政治信息传播空间	(81)
四 负面影响表征	(82)
第五节 本章小结	(84)

第三章 政治机会结构变迁:理解政治参与新视角

(85)

第一节 政治参与的传统分析视角	(85)
一 结构功能主义与制度分析路径	(85)
二 基于国家能力的分析路径	(87)
三 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路径	(88)
第二节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溯源及构成要素	(91)
一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背景	(91)
二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解读及其发展	(97)
三 政治机会结构实证探索	(101)
第三节 以政治机会结构变迁理解政治参与的理论优势	(106)
一 引领因果机制探索	(107)
二 促进政治参与的过程解读	(108)
三 链接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	(109)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10)

第四章 政治信息与机会结构:拓展中国政治参与新认知

(111)

第一节 互联网新媒体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	(111)
一 互联网新媒体对中国式参与影响的表现	(113)
二 新媒体时代的政治参与模式	(116)

第二节 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中国政治参与	(121)
一 中国背景下的政治机会结构分析要素	(121)
二 政治机会结构变迁的溢出效应	(127)
三 中国政治机会结构变迁	(131)
第三节 本章小结	(133)
第五章 实证及验证:透视中国政治参与新佐证	(135)
第一节 实证研究背景	(135)
第二节 案例实证研究:上访与上网	(137)
一 案例引入	(137)
二 案例过程	(140)
三 案例诠释与关键启示	(148)
第三节 数理实证研究:信息与机会哪个更重要	(151)
一 研究假设	(151)
二 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151)
三 分析结果	(157)
四 回归假设检验	(161)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64)
结论 国家治理回应: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新思考	(167)
第一节 什么是国家治理	(167)
一 国家治理的提出	(168)
二 理解国家治理	(170)
第二节 “国家治理”的理论意义与价值	(174)
第三节 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政治参与回应	(179)
一 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组成要素的政治参与	(179)
二 国家治理回应类型及影响	(180)
三 国家治理回应的应然逻辑展望	(184)
四 嵌入国家治理的政治参与回应指向	(186)
参考文献	(189)
后记	(218)

图表目录

图 0-1	政治信息、政治机会结构与政治行为相互影响关系	(2)
图 1-1	SSCI 有关网络政治、社交媒体文献发表检索结果	(12)
图 1-2	1995—2011 年间发表在线政治传播(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文献最多的期刊(占刊发总量的 50%)	(13)
图 1-3	SSCI 数据中有关“政治机会结构”研究文献学科分布共现网络	(14)
图 1-4	SSCI 数据中有关“政治机会结构”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	(15)
表 1-1	CSSCI 数据中有关“新媒体”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	(16)
图 1-5	CSSCI 数据中有关“新媒体”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	(17)
图 1-6	SSCI 数据中有关“新媒体”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	(17)
表 1-2	中国知网数据(CNKI)中有关“新媒体”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	(18)
表 1-3	政治参与阶梯分类	(24)
表 1-4	对互联网不同影响力的观点	(28)
图 1-7	新媒体对个体政治参与影响	(33)
表 1-5	互联网对政治参与行为影响不同研究路径和不同观点比较	(36)
图 1-8	政治机会结构的分析框架	(42)
表 1-6	政治机会输入和输出结构比较	(43)
图 1-9	治理的分析角度与使用维度	(47)
图 2-1	全球因特网主机增长趋势(1981—2012 年)	(63)

2 变迁中的政治机会结构与政治参与: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图景

图 2-2	2009—2012 年世界不同区域报纸发行量变化	(65)
图 2-3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均互联网普及率	(69)
表 2-1	新媒体与用户的互动参与类型	(70)
表 2-2	代表性新媒体互动参与类型区分	(71)
表 2-3	中美互联网普及率对比(%)	(73)
图 2-4	创新技术扩散曲线	(74)
表 2-4	2013 年中国网民对各类网络应用的使用率(%)	(76)
图 2-5	麦奎尔媒介影响效果模型	(78)
表 2-5	佩尔斯(Perse)媒介效果的四种模型	(78)
表 2-6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比较	(82)
图 2-6	美国民众支持国防开支与主流报纸报道数量对比	(83)
图 3-1	国家能力与民主化水平关系	(88)
图 3-2	斯梅塞尔价值累加理论	(93)
表 3-1	政治参与不同的研究路径及理论	(94)
图 3-3	政治机会结构经典影响因素框架	(98)
图 3-4	扩展的社会运动领域研究中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模型	(99)
图 3-5	甘姆森和迈耶对政治机会结构的分类	(100)
图 3-6	政治机会结构的输入和输出	(103)
表 3-2	政治机会结构实证研究举例	(104)
图 3-7	政治机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解释维度	(106)
图 4-1	媒介传播对社会整合的四种效果	(111)
表 4-1	2003—2012 年互联网推动的公共政策舆情事件比重	(114)
图 4-2	近年传统媒体和“意见领袖”在舆论议程 设置中的作用(抽样:120 件)	(115)
图 4-3	媒介与社会关系示意图	(116)
表 4-2	不同参与类型的线上参与行为和线下参与行为对比	(117)
图 4-4	线下参与行为举例与变迁及其对应的线上行为类别	(118)
图 4-5	在线讨论引导线下行为:显性机制和隐性机制 分析框架	(119)
表 4-3	公众与公共管理者相互冲突的期望值和价值观	(124)
图 4-6	中国矩阵式治理结果模型	(126)
表 4-4	中国政治机会结构要素分类	(127)

图 4-7	政治参与发生与政治机会结构关系	(131)
表 4-5	国内政治机会结构对抗议行为对政策影响的效果	(132)
表 5-1	信访和选举在中国的发展和演化	(136)
图 5-1	2001—2011 年上海年均信访总量(批/件)	(140)
图 5-2	中国信访体系结构	(142)
表 5-2	中国政府建立网络信访体系的历程	(144)
图 5-3	信访学术研究趋势	(147)
表 5-3	案例在政治机会结构和信息媒介维度的展现	(149)
表 5-4	历史视野下的中国政治机会结构变迁特征	(150)
表 5-5	样本框抽样设计	(152)
表 5-6	连续变量描述统计	(156)
表 5-7	虚拟变量描述统计	(157)
表 5-8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158)
图 5-4	标准化残差的直方图	(161)
图 5-5	标准化残差的正态概率累积图	(162)
图 5-6	标准化残差与标准化预测值散点图	(162)
表 5-9	修正异方差后的模型与原模型分析结果比较	(163)
图 6-1	国家治理结构性要素	(174)
表 6-1	“国家治理”作为学术概念的优势体现	(175)
图 6-2	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与群体事件发生件数对比	(181)
表 6-2	不同国家治理回应类型比较	(183)
图 6-3	新浪热门政务微博分类	(185)

导 言

第一节 研究源起

回顾 20 世纪以来的政治发展，形式各异的政治参与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深化，既见证了现代政治社会的进步，又从实践中促进了当代政治理论的发展。现实世界，政治参与的践行需要若干必不可少的条件性因素，如依托充分政治信息以做出有效的参与选择判断；基于不同外部政治环境判断采取不同的参与策略。前者需对不同信息媒介传播、筛选、获取等过程具有较好的判断力和应用能力，后者则要对外部政治结构变迁、演化等不同节点具有较好的识别力和应对能力。从政治科学理论研究出发，学术话语中的表述则为本书引入的两个关键概念——政治信息传播载体与政治机会结构。

政治信息传播载体较容易理解，泛指散发此类信息的纸质媒介、无线电媒介、数字媒介等；而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OS）这一概念虽然在国际学界中常被用来分析和解释政治参与行为和社会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但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并未被广泛地接纳和使用，因此首先有必要对其进行初步的界定。

本研究中，政治机会结构概念意指在国内外政治环境、政治介入的有效通道、国家能力变化、政治精英分化等不同要素的有序搭配和排列情景下，政治参与个体或群体的行为选择、参与策略及参与结果展望的内在调整和转换。

在以互联网新媒体等数字媒介作为政治信息传播载体的今天，其一方面促成政治机会结构内部要素的变迁，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参与过程中可获取的政治信息更加充分，政治动员信息传播更加便捷。传统研究中，对政治参与发生与否、比例高低、规模大小主要采用以下相关理论予以解释：（1）理

2 变迁中的政治机会结构与政治参与: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图景

性政治人,由此产生的理论是参与成本分析和经济投票理论;(2)政治冷漠,由此产生的理论聚焦于政治效能感和参与心理分析;(3)政治参与信息获取,由此触发的理论是政治动员和政治信息传播探索;(4)政治参与渠道及参与扩大化,由此阐发的理论如政治机会结构;(5)国家、政府对参与行为的规制,即国家治理的回应策略和回应类别。其中第一和第二的理论解释验证在笔者已有研究和国内其他学者研究中均有所涉及,并对其理论在中国适应性和解释力做出了相应的阐述,而对于后三个主题的相关研究尚为空白。

在此背景下,以中国为例,分析信息传播革新和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两个因素是否扩大了中国政治参与规模,是否改变了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选择、参与策略及参与形式,以及相应的国家治理如何回应成为本书的中心议题。

社会科学特有的解释性使命也带来本书对此问题归纳性诠释和创新性探索。本书首先从破解政治信息传播媒介、政治机会结构变迁、政治参与行为变化和国家治理回应等四者间相互影响关系入手,解读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中国政治机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政治参与新动向,比较信息传播载体与政治开放机会对政治参与影响程度的强弱,进而详解此时期国家治理的吸纳能力与回应策略。(参见图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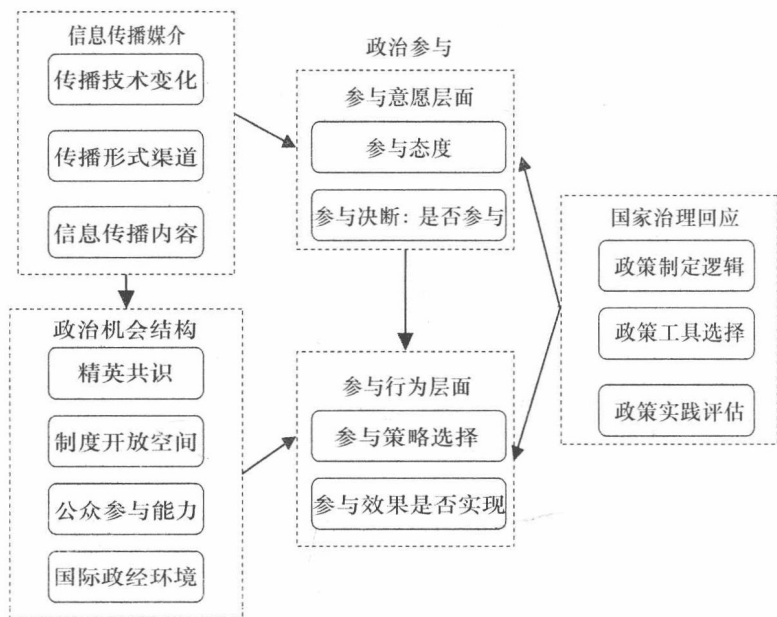


图0-1 政治信息、政治机会结构与政治行为相互影响关系

通过以上学理论证,在现实意义层面,重新呈现当前中国政治参与、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政策回应的匹配程度,探索国家获得转型动力的价值管道,以期为剧烈变革时期的政治社会转型提供理论支持,贡献理论积淀。在学科理论贡献层面,通过系统地检验比较政治学中的主要理论,将中国新媒体时代的政治结构变化与国家治理回应实践,纳入政治学比较研究的视野,将中国实践和经验的理论化成果纳入政治科学理论体系之中,建构转型国家比较分析的新进路。

此外,在对个体意义层面,这类问题探索还有助于公众客观认识和比较政治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径,有助于对国家社会未来发展进行预判和解读,因为,作为政治人的个体难以在如此剧烈的转型社会中,对这类问题的思考置身于外。

第二节 研究方法

从政治科学影响力而言,如果学者希望自己的工作受到公众支持和关注,就需要对与政治有关的“宏大主题”展开深入研究并积极主动向公众传达他们的研究成果,但当前政治学者对诸如国家治理这类既具有现实关怀又具有宏观视野的主题,其探讨的深入度和清晰度还远远不够。如约瑟夫·奈在《政治学靠边站》一文所言,“政治学正在滑向沉迷于各种说辞,脱离政治现实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危险方向”。^① 这种研究方法取向还对政治学的初学者带来深刻影响,忽略政治现实主题使得政治学专业学生从一开始就聚焦过小的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和相关性验证,却无助于对政治现实的理解和解释。派卓斯克(Petrocik)曾以政治学中选举研究为例,指出目前此类问题的研究方法“忽略对经验事实的解释”,^② 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是“使可观察的经验规律淹没在日益增长的复杂模型之中,遮蔽研究中重要的背景信息”。^③

① Joseph S. Nye Jr., “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3, 2009.

② Petrocik J. R. & Steeper F. T., “The Politics Missed by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8 (3), 2010.

③ Hood C., “Public Service Management by Numbers”, *Public Money and Management*, 27 (2) (2007) .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政治学由于深受统计方法和技术模型的影响,数理模型在实证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基于历史、文化和档案的政治学研究处于边缘,也使得这类研究成果更难发表。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近年来政治学研究同样难以避免此种影响。进而导致政治学研究中方法论存在使用不平衡,一方面是定性、定量和形式数理研究方法使用不平衡;另一方面则是同一学科中,不同研究方法采用的不平衡,如“美国政治”研究中使用定性方法要低于“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等政治学的分支学科。^①

现代政治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快速发展之后,由于方法论选择或偏好所造成的研究视野和范围缩减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总体而言,就是过于关注调研,强调抽象化而非现实关注,忽略重要议题或宏大议题,忽略文本,导致“诸多已发表文献的研究动机多为方法驱动的研究倾向(Method Driven Research)而非议题驱动的研究结果”。^②

而 21 世纪社会科学研究最大变化是从“问题发现”转变到“问题解决”层面,^③这种转变也需重新审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分野。

如定量分析取决于模型的解释力、变量的因果关系效力及统计显著性,但跨国定量测量会有很多问题,如“标准化与非标准化系数误用、测量误差和可靠性差异影响、总体误差率及其带来的分析、概念对等性”。^④而 30 年前大卫·里奇(David Ricci)甚至认为:定量研究表面上带来的是政治研究变得更专业化和科学化了,但事实则是政治学的悲剧,“因为这将降低政治学作为对当前国家体制和民主价值支持解释功能的发挥,提高公众对政治学的理解门槛”。^⑤

而定性分析通过因果机制推演来识别自变量与因变量是否存在联系,

① 政治学在美国进一步细分为美国政治、国际关系、比较政治等。Pierson P., “The Costs of Marginalization: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0 (2), 2007, pp. 146 - 169.

② Pierson P., “The Costs of Marginalization: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0 (2), 2007.

③ King G., “Restructuring the Social Sciences: Reflections from Harvard’s Institute for 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ce”, 2013, Copy at <http://j.mp/Wj5iBC> Export BibTex Tagged XML.

④ Singh J., “Measurement issues in cross - 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6 (3), 1995, pp. 597 - 619.

⑤ Ricci D. M., *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在比较过程中探索社会现象对理论发展和管理实践所具有的意义,有助于揭示理论普及化和概括化过程中的问题,揭示理论适用的边界,提供理论演化时间轴的指引。定性研究者由于趋向于相信社会是复杂的,其还被“路径依赖、反馈循环、临界点、交互作用、等效性(Equifinality)、多效性(Multifinality)等形塑”。^①

以上这类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之间的主要区别及其所存在问题,也有学者认为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②只是因为“不同方法使用者有不同的研究目标”,或者只是使用不同的研究文化理念来分析同一类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③

虽然当前政治学研究方法取向上存在过多自我限定的壁垒并招致诸多批评,但2009年盖里·金(Gary King)等主编的一本有关“未来政治学研究”主要或潜在议题的图书中依然指出:“个体行为分析和比较分析依然居于未来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地位。”^④只不过,对这一政治学研究主题的进一步探索则需要重新思考或融合不同方法论的使用。

因此,本书研究中,笔者更愿意通过采用研究方法的多元和多样,以充分融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优势。而这也才是解决诸如“美国政治学协会”在《21世纪的政治学》中所焦虑的“21世纪的政治科学究竟定位在哪里”等疑问的不二法门,力求避免政治学研究方法分裂所遭遇的普遍困境和焦虑。进而也在本书研究中实现架构国家治理这一宏大主题和新媒体时代的政治机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政治参与新动向这类微观现实之间的桥梁,因为,如果仅基于量化实证或实验研究的角度,则难以实现深入的理论探讨和逻辑推演;或不恰当的研究方法使用导致不明晰的逻辑进路,造成概念混淆和研究目标路径混乱。此外,当前定性研究中常将比较历史分析作为方法论的首选,导致相关理论研究难以及时被实证验证、识别和挑战,又造成理论解释力和适用性的不足;而定量分析中则由于未能

① Bennett, Andrew & Elman, Colin, “Qualitative researc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ase study method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9, 2006, pp. 455 - 476.

② Levy J. S.,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cross - method dialogue in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0 (2), 2007, pp. 196 - 214.

③ Mahoney J., & Goertz G., “A tale of two cultures: Contras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Political Analysis*, 14 (3), 2006, pp. 227 - 249.

④ King G., Schlozman K. L. & Nie, N. (Eds.),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 Taylor & Francis US, 2009.